書　評
考古人類學刊・第 76 期・頁 139-152・2012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 Gustavo Lins Ribeiro and Arturo Escobar. Oxford, UK; New York: Berg, 2006. Pp. 341.

葉 淑 綾
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暨南島文化研究碩士班助理教授

前言

由 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2006）所編輯的 *World Anthropologies: Disciplinary Transformations within Systems of Power*，邀請不同的學者分別對在日本、西伯利亞、中國、墨西哥、法國、西班牙、非洲、英國、秘魯、澳洲、印度、和巴西等地的複雜情境中所發展的人類學進行描述，他們並且肯定在各地不同的時空脈絡中所發展的人類學，對於「世界人類學」的形塑皆扮演可能的貢獻。這本書提出「世界人類學」這個概念與計畫，是試圖多元化和複數化人類學現存的圖像，創造新的知識生產的結構，反對將文化的多元性貶抑到單一的模式之中。同時也鼓勵人類學者形塑新的跨國社群，以及創造新的對話和交換的可能性，讓未來人類學能成為包容異質、重視多元性和創造性的社群。這本書從世界體系、知識的地理政治、多元性、和地方化歐洲等脈絡來談「世界人類學」的計畫，一方面批判地檢視目前由核心與邊陲之間不平等的交換關係所形塑的人類學實踐，另一方面則試圖透過具體的行動，讓人類學的伏流和邊陲知識成為可見，讓「世界人類學」內部交換模式和溝通實踐的多元化，得以豐富與滋養人類學的理論、認識論和方法論。

世界人類學的脈絡

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導言〉中提到，從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的概念著手，可以突顯出當代社會科學和學院也被權力關係和以歐洲為中心的資本主義擴張所結構的特色，在邊陲或南方人類學者的論述中尤其反映出這個觀點。例如，在瑞典學者 Tomas Gerholm 的人類學世界體系觀點的啟發之下，日本學者 Takami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Kuwayama 提到，美英法三國構成人類學世界體系的核心，這三國的集體權力讓其他國家的人類學成為邊陲。由人類學核心國所界定的世界體系決定了關於他者或他文化的知識生產、傳播和消費過程所涉及的政治關係。在這些核心國家中，具有影響力的學者決定了何種知識應該具有權威和應該受到關注，而知名人類學期刊的評審制度，則進一步加強了世界體系的不對稱結構，導致在邊陲生產的知識，不論其重要性和價值為何，只要不符合核心國所界定的標準和期待的話，就註定在地方埋沒的命運。

近年來，世界體系的概念被另外兩個重要的觀點所豐富，一個是知識的地理政治（geopolitics of knowledge），另一個則是地方化歐洲的計畫（provincializing Europe projects）。由 Walter Mignolo 所發展的知識的地理政治，透過邊界思考（border thinking）和權力的殖民性（coloniality of power）等概念，來強烈批判以歐洲中心主義所解讀的現代性，並且建議從外部來檢視現代世界體系，以及從殖民的差異性來超越歐洲中心主義。如此一來，才可能將擁抱知識的多元性（epistemic diversity）作為一個共同的計畫，透過擁抱 diversality 來超越以歐洲中心主義所結構的世界體系，超越現存人類學世界體系的僵化模式。因為目前的體制阻礙了不同文化思維交流的複雜形式的形塑，所以需要改變。而 diversality 這個新字彙的採用，是為了突顯「朝向普同的人類學」和「朝向多樣性的人類學」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建設性張力。「世界人類學」的計畫就是要包納 diversality，將 diversality 作為全球不同的文化思想相互交流的重要觀點。

再者，「世界人類學」的計畫也與 Dipesh Chakrabarty 地方化歐洲的嘗試相互關聯，Dipesh Chakrabarty 透過展現歐洲的思維和經驗是特定時空的產物，而非具有超時空的普同性，來試圖超越以歐洲為中心的現代性，並且嘗試從現代性的邊陲來檢視是否有更新和轉變目前主流認知形式的可能性。不過，他的地方化歐洲的計畫目的並非採取極端的作法，來斷然拒絕和歐洲相關的現代性、自由價值、普同、科學、大論述、和整體化解釋等特性。換言之，雖然理性、科學和普同等一些用來界定歐洲成為現代的要素是特定文化的產物，但是歷史發展至今，這些要素已經不再僅屬於歐洲文化。對 Chakrabarty 而言，歐洲的思維模式在思考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性的經驗時是不適當的，但卻也是不可或缺的。他建議以對話的態度來避免浪漫或二元對立的立場，他同時也意識到如果沒有啟蒙理性主義的普遍性，當代探討社會正義議題的社會科學可能並不存在。不過，他也強調，在當代全球化的學術世界中，如果將不同文化理解生命的多元形式全都轉譯為普同的歐洲類別，卻也是相當可議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人類學歷史的回顧

回顧人類學的歷史，從它誕生的那一刻開始，就深深地和世界體系的動力連結在一起，被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國家建構、和他者性等因素在國家與國際情節中的變遷角色所調節。和英美法人類學學界規範的論述形式與體制實踐相關連的主流人類學，在1960 年代受到去殖民化、反帝國主義抗爭、民權運動、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主義的興起等因素的影響，產生了不小的危機感。當知識和權力的關係被揭露時，Eric Wolf 所稱的「人類學的純真年代」開始終結。人類學的批判成為極度痛苦的文學，深化了人類學自我再現的模糊性。人類學是作為帝國主義的同夥、暴力的小孩，抑或是準備好成為質疑西方霸權的革命性場域。在後現代的時刻，客觀主義的、規範的、和本質主義的文化概念受到強烈的批判，反之，任何文化事實皆是歷史化的、多音的、政治的、和論述的特色被加以強調。

但是，後現代的批判也有相當程度的侷限。例如，南非人類學者 Archie Mafeje 認為，這些批判仍是將人類學所存在的學術環境視為理所當然，並且保護這些理所當然的學術實踐。多數的批判不但無法看到，在知識的去殖民形式中被殖民者的角色，而且他們大多數對於非主流人類學仍抱持沈默的態度。可以說在人類學先前的批判之中，多元性這個議題尚未被適當的處理，而且過去不同文化思潮的交流也時常侷限在有限的範圍之內。雖然目前某些單位研究人員國籍的多元性持續增加，但是這個發展並沒有相應帶來多元人類學的生產與理論發展。

再者，人類學從發展之初即傾向跨國主義，比如包亞士領導的 Jesup 北太平洋探險隊的跨國合作，影響西伯利亞人類學的發展。而人類學的研究也時常意味著移動到外地去進行他文化的研究，還有這個學科也透過西方大學體系向全球的擴張而發展。「世界人類學」計畫的發展也和人類學內部的跨國動力學緊密相關，既關注各地人類學在跨國交換的過程中所開展的不同歷史，且跨國的網絡與活動也可以成為培養「世界人類學」多元觀點的重要場域。例如，日本人類學在帝國主義、國族主義、和跨國主義相互交錯影響之下，走出了不同於西方的發展軌道。中國人類學也同樣被國族主義、跨國主義、和反西方霸權的互動所影響，即使在 1980 年代之後逐漸國際化，中國人類學並沒有邁入西方所支配的單一道路之內，反倒是在強調國家優先的基礎上，讓鄉村發展研究和少數民族研究等在地化的力量持續形塑中國人類學的特色。另外，墨西哥和秘魯人類學的發展雖然深受主流人類學特別是鄰近美國的強烈影響，但是從拉丁美洲經驗發展出來的特殊網絡也在形塑這兩國的人類學。加上國內土著人口的多數存在，強大的國族建設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畫，以及對於種族和文化的持續爭辯等內在因素，都在影響秘魯和墨西哥人類學的國家與跨國體制的建構。

從各國人類學不同的發展過程來看，雖然各地的人類學不可避免採借且調適自身，以符合主流人類學所發展的觀點，但是在國內外複雜關係所交錯的地方情境中所發展的人類學，仍有其獨立自主和多元創造的時刻，而這些時刻就是它們作為「世界人類學」的時刻。因此，「世界人類學」的計畫期望突破西方與非西方或中心與邊陲的二分關係，試圖創造與思考各式各樣的人類學目前和未來可以相遇交流的共同空間。作者們強調即使是在特定霸權結構的宰制壓力之下，也要努力滋育人類學的多元化。就各地人類學的發展情形而言，要找到全然脫離西方人類學的人類學存在是不可能的，因為很多本土人類學的觀點也歷經了多由西方所中介的批准過程。目前人類學內部資訊的不均等交換和多元性時常以下列的方式被描繪，包括中心相對於邊陲人類學、帝國建構相對於國族建構的人類學、主流相對於非主流的人類學、或者北方相對於南方人類學等。但是，這樣的描繪方式其實不足以讓我們瞭解到當前複雜的跨國秩序。

要對目前人類學內部不均等的交換進行批判，不應該採取非此即彼的異位角度，而是要試圖超越既存的權力結構，讓各式各樣既存的文化主體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眾聲喧嘩地進行對話與交流。但是，這進一步涉及目前英語成為國際學界溝通的主要工具，對於「世界人類學」的理想可能帶來的威脅。單一語言化的結果不但持續加深資訊取得與擴散的既存不平等，也威脅學科的創造力與概念多元性的發展。目前很多英語界的學者書寫的論文沒有引用任何一篇非英語的文本，這對於歌頌多元性的人類學而言是有問題的。應該透過對世界各地人類學文本的承認，來修正既存的不均等關係，讓人類學的生產多音呈現。同時也要鼓勵非主流人類學者的作品以非英語進行發表，以增加水平交換的機會，創造更多非正統的對話與溝通的管道，以建構和加強更多異質的專業網絡與計畫。

在過去二十年，跨國主義、新自由主義、和快速全球化的發展，已經讓人類學者在其內運作的社會和體制脈絡產生相當大的變革，各地人類學者對於知識論的關注也同樣歷經變遷。「世界人類學」的概念對於知識和異類的議題討論特別合適，因為此概念活化理論與政治的反思性的潛力持續地在增強。知識的差異和「世界人類學」的相關性可以擺放在現代性的大脈絡之中進行豐富的討論，由於現代知識的殖民性質，可以說關於知識的議題就是關於現代性的議題。雖然來自中心的學者清楚地瞭解現代性在世界各地的發展，是不斷被磋商、競逐和混和的過程，他們卻仍然認為現代性是一個不可避免的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普同。但是，許多社會行動者的實踐，則暗示了對這類普同現代性的宣稱抱持懷疑的態度。

以 Sandy Toussain 介紹澳洲人類學時談到的澳洲原住民土地宣稱運動為例，人類學者要面對的不僅是在多元場域生產且走向多元方向的多元知識，還要面對轉譯和無從比較的議題。這些因素迫使人類學者走向不可預期的方向，但這反而與「世界人類學」的可能發展密切相關。因為人類學者涉入原住民土地權宣稱的過程，不只是為人類學者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也為人類學生產豐富的資料，比如說對原住民土地所有權有較廣泛的瞭解。再者，這個過程也逼人類學者去面對許多重要的問題，包括如何詮釋文化信仰和實踐的延續與變遷的問題？系譜資料的真偽？可以在法院被法官認定為證據的事物？這些證據之物和傳統之間的關連又是什麼？這些問題不僅涉及對傳統主流人類學的批判，以包容更多元的人類學發展，也涉及人類學的知識如何在熟悉人類學的群體之外被聽聞且被瞭解。例如法律和人類學的論述相當不同，人類學者在土地宣稱的脈絡中所呈現的多重知識，卻很少是說服法官的證據知識。人類學者必須努力對那些擁護他種知識形式的人傳達複雜的資料，因為除了那些被賦予權力和權威的法官之外，有時甚至和人類學者合作進行土地權宣稱的原住民也不太瞭解人類學的知識。

人類學不該只是一種傅柯式的批判實踐，而是應該更積極地為替代夢想提供梗概，成為為自身也為世界包納多重可能性的無窮計畫。綜觀人類學的歷史，不同地方和不同年代都有飽受爭議的人物、替代的知識、失敗的實驗、以及創造與革命的時刻。在這些邊陲性、爭議和大膽的創新之中，反而更能清楚地看到「世界人類學」發展的要素。比如說，Eduardo P. Archetti 介紹法國人類學時提到，在一般的人類學史描述中，談到 Dumont，可能會看他對於印度、卡斯特體系、和個人主義等議題的影響。但是，如果以不同的方式來描述社會人類學的歷史，看 Dumont 所發展的觀點和模式在不同地方的影響力，反而顯示出在漸增的國際化的情境之中，觀念的複雜性和無所不在。像挪威的人類學者就針對 Dumont 對性別角色與關係的忽略進行檢討，而巴西的人類學者則應用 Dumont 的理論來理解現代性的複雜。不過，在法國人類學的發展，和歐美傳統對於現代性的討論，反倒是未受到 Dumont 理論模式的影響。這呈現出 Dumont 的貢獻在邊陲被中心化，在中心反而被去中心化，也彰顯出人類學成為國際學科的錯綜複雜的方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文化間際性的概念

這本書從世界體系、知識的地理政治、多元性、和地方化歐洲等脈絡，來說明現今人類學不盡理想之處，進而認為有必要對目前人類學實踐的相關知識和體制進行重大的變革，在目前獨白式的霸權環境中，努力營造多中心的景象。不過，「世界人類學」的計畫雖然致力於複數化人類學現存的圖像，讓人類學不再只被核心霸權所形塑，而能對全球化眾聲喧嘩的可能性抱持開放的態度。但是，這個計畫的最終目標並非多元文化論，而是文化間際性（interculturality or interculturalidad）的政治和理論立場。如 Nestor Garcia Canclini 所言，多元文化的概念承認文化的多元性和差異，因而建議彼此尊重的相對主義政策，但是這種作法反倒加強了不同文化之間的分隔。反之，文化間際性指涉不同文化之間的對質和糾纏，觀看群體建立關係與交換互動時的所作所為。換言之，多元文化和文化間際性意涵了兩種不同的社會生產模式，多元文化假定了對於異質的接受，文化間際性則強調互動的脈絡，暗示不同與差異是在磋商衝突與互惠的授受關係之中形塑而成的。因此，在肯定世界各地所發展的人類學皆有能力對話地貢獻於一個複調多聲且跨國的知識建構過程，且強調多元人類學知識建構的必要性的同時，本書的作者們並沒有將權力、歷史和知識的複數化本身視為目的，反而認為這些複數化的過程是邁向在多元性的傘翼下後同一性政治的步伐(a step toward a post-identitary politics under the umbrella of diversality）。

相應於美國的多元自由主義，在南美安地斯地區所發展的文化間際性的觀點，是透過現代性和土著性的複雜連結，來挑戰由現代性所全面支配的本體論和知識論。強調不同文化的主體雖然可能在現在性的特色中，找到價值的來源和同盟，但卻不必然走在邁向現代性的明確路途中。因此，對於許多原住民和族裔運動者而言，尋找知識的替代核心，以及進行替代知識的創造，是他們奮鬥的重要目標。這些社會運動者似乎比學者更為清楚，人類所生存的世界是由多元的時間、生計型態、和知識所組成的。文化間際性的概念代表了不同的文化在權力的脈絡之中對話與交流的過程，這個觀點也為人類學者帶來豐富的機會，去深入瞭解知識論的議題，以及對人類學進行多元的實踐。

再者，Marisol de la Cadena 在介紹安地斯人類學時提到，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族裔社會運動者、以及相關機構之間對於文化間際性的爭論，也突顯出翻譯和能否比較性的議題。在 1960 年代秘魯作家兼人類學者 Jose Maria Arguedas 試圖對此議題提出看法，他透過一個同時是現代和非現代，西方和非西方，卻不可視之為雜種的連結實踐，努力建構同時由魔法和理性所激發的多元本體論。Arguedas 在 60 年代所出版的小說「所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血（All the bloods）」，在當時是一種無法想像的知識論革命。60 年代的秘魯盛行的是現代化理論和線性的歷史論述，當時國家採行涵化（Mestizaji or acculturation）的人口政策，目的是要提升落後的印地安土著，將他們轉變成為農民或都市人（*cholificacion*），讓拉丁美洲的未來和北美鄰國有並駕齊驅的可能性。但是，其實這種論述也意味著明明和北美人處於同一時空的印地安人，要安然接受他們被再現為是位處於落後的演化階段。

同時，60 年代也是秘魯的大地主和土著農民之間劇烈衝突的時期，農民運動的成員受到正統馬克思理論、依賴理論、和土著政治的共同啟發，他們利用衝突來成功地奪取大牧場的土地。Arguedas 的小說雖然同情農民的奮鬥，不過，他透過小說所規劃的藍圖，卻與左派知識份子的政治腳本是相互衝突的。左派知識份子認為起義的農民受到階級意識的啟發，將會脫離印地安的傳統與迷信，去印地安化，而進入現代化的歷史階段。也就是左派的革命計畫需要的是農民或工人，而不是迷信的印地安人。但是，Arguedas 透過小說來爭論這種單線式的轉變，因此對於當時鼓吹現代化進步思想的知識份子而言，這部小說挑動了他們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而更加不可接受的是，這部小說對無論是左派激進或者右派保守計畫所設想的單數現代主體的支配性，提出了一種知識論的挑戰。

一方面，Arguedas 提出一種另類的土著社會運動，表面上好像可以作為現代左派運動的重要同盟者。但是，這部小說所呈現的卻是一種非現代的混雜邏輯，強調文化修養和現代政治對於土著運動而言是重要的沒錯，但它們必須被選擇性的使用和翻譯，而不是以根除所有屬於本土的方式來被全盤接受。同時 Arguedas 認為國家計畫的進行也應該考慮土著的知識形式，這個觀點進一步挑戰了社會主義者的知識與權力的前提，社會主義者所需要的是已經自神靈和魔法中解放的理性同夥，左派的解放政治是將理性視為基本的教條，但是這本小說明顯反對只偏重理性的立場。另一方面，Arguedas 也在建議另類的知識政治，他雖然不否認西方理性的必要性，卻也認為西方理性可能是無法翻譯的，更別說是掌握或者取代安地斯印地安人的存有方式。不過，他所提議的不只是一種多元主義式的容忍，還是一種多元本體論的觀點，是一種既一般又獨特的國家主義，同時是理性的也是魔法的。在他的小說所開創的魔幻寫實的文類中，怪異不再被視為怪異，而是有如一般的事物。同樣的，在他的生命裡，怪異也被視為一般，作為他的主體性的一部分，而不是被研究的客體。

在 60 年代和隨後數十年，秘魯學界在現代化理論和嚴格的政治經濟立場的影響之下，讓 Arguedas 對另類知識形式的政治建議消聲匿跡。Arguedas 的遭遇顯示了知識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產的政治，也彰顯了秘魯主流的社會科學家如何受到歐美知識形式的支配，否定 Arguedas 的嘗試，在一個邊陲的中心貢獻於西方現代化普同知識的霸權。直到 80 年代之後，對新自由主義政治在拉丁美洲所造成的負面影響的反抗，印地安文化的回歸，以及訴求土著權利和民族自決的社會運動逐漸增強的政治重要性，施行土著公民權的要求，種種因素開始引發當地人對現代化簡單普同的理論觀點進行挑戰，也向涵化理論必然邁向現代人的目的論進行對抗。過程中眾聲喧嘩，要求國家尊重不同民族的獨特性，同時也挑戰國家的霸權。80 年代的土著運動的領導人，同時結合鄉村和都市經驗，巧妙地挪用現代實踐並進一步轉變其邏輯。例如，這些政治抗議運動誇大地使用安地斯山脈的儀式圖像和法規，因此將屬於世俗領域的政治去世俗化，也讓這些去世俗化的政治儀式挑戰官方版的國家歷史，意圖讓土著運動者的身影和觀點進入政治的萬神殿之中，以進一步將歷史去殖民化。

雖然重寫歷史和轉變國家政治慣習的過程也充滿了鬥爭，但是至少鬆動了土著演化宿命的論述，讓土著異質性的政治得以開展。更重要的是，土著知識份子的公開戰鬥意味著複數知識的揭竿，過去被科學思維界定為地方的、不合格的、和不合法的認知方式開始起義，這讓知識邊境的可能性逐漸浮現，在那裡理性和非理性知識同時存在，透過社會行動來混合組織，以進行轉變現代國家的政治計畫。在拉丁美洲，這些嘗試被稱為文化間際性（interculturalidad），意圖創造一個承認人民多元性的多民族國家（plurinational state）。文化間際性的概念反對之前盛行的涵化理論（mestizaje）在權力和知識方面的殖民性，以及它背後所意涵的歷史階段性論述。這個概念有個具有野心甚至激進的視野，企圖鍛造一個各種人群和文化都能夠基於正義公平和諧共居的世界，要創造一個新的國度，營造一個能生產不同知識型態的場域。土著的社會運動相當關注另類知識中心的創造，要形塑一個多元的空間，這個空間不是只為了土著或生產土著知識而存在，而是為了新的概念、新的分析架構、新的類別、和新的觀點的生產而存在。

另外，文化間際性的概念也在反思批判現代科學作為獨白體的形式，這種形式透過建構自我指涉的類別，不允許奇異和差異包含進現代知識的界線之內。而作為現代知識的人類學也是透過創造和維繫土著作為他者，以及透過排除土著自我瞭解的能力來建構人類學自身。因此，Marisol de la Cadena 建議未來的人類學應該由關係的知識論（relational epistemologies）所連結，將關係的知識論視為在地的知識位置（a situated knowledge position），一方面假設普同類別的歷史偶然性，二方面則將普同的類別放在與地方思維對話的過程中使用。並對普同類別和地方思維兩者之間的轉譯過程要賦予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厲且批判的關注，讓地方知識成為可見。關係的知識論致力於消除主客體的位置，將他者視為能言、能思、和能知的自我來進行互動。如此一來，將有潛力發展克服西方獨一性的多元能力，有潛力創造複數人類學現身的條件，且集體地成為一個全世界而非只是西方的學科。人類學研究他處的異文化，是一個由非西方的地境所成就的西方社會科學，要肯定人類學所處的位置的確能夠貢獻於他種知識形式的能見度。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深刻地認知人類學的知識是地方和普同之間、小歷史與大歷史之間、以及獨特與一般之間轉譯的對話過程。

世界人類學的六問

不同於國際人類學（international anthropology），「世界人類學」的概念強調營造一個較為完整的人類學空間，多元性而非單一權威的實踐，一個共享的母體，一個競爭中的普同。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本書的導言以及 Johannes Fabian 在本書的結語中，進一步透過「who, what, how, where, when, what for」這一系列的問題來看「世界人類學」如何挑戰目前既存的人類學。除了這些問題之外，這本書也建議要學習去問學院領域之外可能引發的問題，至少過去二十年在邊陲的文化政治運動者已經清楚地表明，他們正在生產的關於社會文化過程的知識是需要被嚴肅看待的。

首先，關於誰在研究人類學和人類學研究什麼的問題，研究主題和知識生產者的多樣化也是造成人類學轉變的核心所在。尤其，人類學在二十世紀的基本轉變之一即是來自於研究客體的主體位置的變化。也就是曾經作為人類學的研究客體，在今日成為研究的主體，是知識的共同生產者。未來人類學的研究應該轉向彼此，帶著對知識、知識論和政治差異關注的眼神，將既存的人類學世界體系去中心化，致力於建構多中心的理論架構，是邁向「世界人類學」的必要條件。依循此作法，才能發掘和人類學相關的其他議題，以及研究這些議題的其他方法與觀點。亦即，研究對象和主題的變化也會對如何實踐人類學產生影響。目前，人類學如何實踐的問題已經不再受到一統的科學方法所保證，知識論的革命為人類學的實踐帶來更為自由的空間。

關於在何處實踐人類學的問題，人類學的田野地點不再必然位於他處，可以是這裡和他處，或者這裡與他處的相互連結。如果田野地點的多元化可以讓人類學脫離自十八世紀發展以來負責研究原始人和異文化的學術分工，那麼也會增加「世界人類學」多元地景發展的可能性，不再受到單數人類學和普同的現代性所侷限，而能致力於發掘各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各樣相互競逐且無窮的普同主義。另外，Johannes Fabian 也提到在十幾年前，人類學的空間討論可能會涉及領域、田野、和中心與邊陲的關係，但今日則必須開始掌握網際網路所開啟的虛擬空間。不過，人類學在虛擬空間中的位置尚未被充分地瞭解，應該在「世界人類學」的計畫之中被認真考量。

再者，關於人類學的時間化（temporalization）的問題，Fabian 談到人類學在去殖民化之後，對所有社會與文化是共時性（co-temporaneity）的認知，讓人類學將研究焦點也轉向現代社會，研究自己的社會。他建議在目前「實踐」似乎比「文化」較適合作為人類學的關鍵概念，「策略」和「計畫」等概念似乎比「慣習」和「設計」較符合人類學所觀察的行動，「反抗」似乎比「順從」較常用來形容集體行動，而「生產」和「發明」似乎較「再生產」和「傳統」來得有趣。不過，他也認為仍須持續地將「文化」、「慣習」、「傳統」等面向視為調查的主題，讓這些面向與「實踐」、「策略」和「發明」等面向之間可以維持動態的張力。

至於人類學實踐所為為何的問題，存在相當多的爭論與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有必要生產可以應付人類迫切需求的知識，或與特定政治形勢相關的知識。有的則認為知識是為了促進重大社會變革而生產的。很少人像 Clifford Geertz 一樣，認為人類學的實踐是為了擴展人類論述的範圍，瞭解不同文化應對困境時的解答，將它們納入人類言說可供諮詢的紀錄之中。這些對人類學實踐所為為何的不同立場雖有意義但不夠充分，目前對於這些立場如何進一步發展也尚未明朗化。

例如，非洲人類學者 Pual Nkwi 在本書中提到人類學在非洲的發展和殖民主義密切關連，這使得非洲的獨立國家將人類學視為無用的學科，對國家建設沒有幫助。因此，轉向應用發展是復興非洲人類學的必要手段，也是人類學對發展計畫能夠產生影響的方式。非洲人類學者並不苦惱於人類學作為學術抑或應用的爭辯，他們必須在既存的侷限環境之中，試圖發展出一個專業且政治的實踐。如此一來，人類學學術取向或應用取向的區分在非洲並不明顯。其他的非洲學者則認為有必要翻轉既存的知識政治，來認真看待多元和立基於地方的人類學論述。如 Archie Mafeje 提出後民族學時代（a post-ethnological era）這個概念，建議從非洲的觀點來發展解構主義者的途徑，強調非學科性（nondisciplinarity），不關心學科的規則或方法，對任何領域進行自由採借。也強調從非知識論（nonepistemological）的途徑來超越對一般論述方法的遵守，進行由主體的文本所組成的新民族誌實踐，以及透過理論建構的後民族學途徑，來超越目前人類學客體化和分類的必要性。像這一類的新實踐，雖然具有爭議性，但卻可能產生新的思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式和組織知識的新形式。

另外，在英國和澳洲，人類學在某些壓力的影響之下，轉向非學術、政策取向和政治取向的研究，人類學的研究對象也逐漸和大眾高度關注的議題之間產生聚合，例如澳洲人類學者對於原住民土地權的研究，以及英國人類學者對於內部少數族群和歐洲英國文化認同議題的探討。雖然這些聚合是在不理想的情況下發生的，例如預算削減、審查要求、生產力論述和諮詢工作增加等，迫使人類學所為為何不得不走向較為政治的方向，讓人類學者處於必需小心應付的局面之中。不過，這也為人類學者創造新的場域，讓他們所生產的知識型態、使用的方法、和知識責任的規範都在歷經轉變。當報導人和參與觀察等傳統人類學概念的箝制開始鬆弛，主流實踐開始消逝，提供掌握倫理和政治議題的「世界人類學」就有更多的機會可以現身。

關於人類學的用處與目的的議題，也可以從知識論的觀點和政治經濟的觀點來進一步討論。「世界人類學」計畫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讓知識和本體的差異處於顯要的位置，且讓這些差異觀點和西方建構世界的方式進行對話。目前人類學面臨的處境是，從前作為研究對象的當地人卻成了挑戰人類學的知識份子，「世界人類學」的實踐者需要有新的概念和新的研究規劃來回應這些挑戰。雖然「關係的知識論」、「知識的差異」等應對的方案對於新情境而言是否有效仍有待觀察，但是重點在於覺察極端差異，以及與差異相關的政治與知識論的問題，目前正在發展的拉丁美洲研究計畫與觀點就是以此作為核心議題。從殖民性的觀點來重新界定現代性，包括瞭解自歐洲征服以來對於底層知識和文化進行系統性壓制的過程，同時也考量對另類思維進行思考，以及對另類世界進行想像的空間建構，這樣的思潮對於建構「世界人類學」的觀點是特別具有價值的貢獻。

另外，Susana Narotzky 在本書中是透過西班牙的例子分析人類學者對地方政治計畫的參與，來回答人類學所為為何的問題，而這進一步涉及「帝國建構的人類學」和「國家建構的人類學」之間的差異。「帝國建構的人類學」傾向研究遙遠的他者，「國家建構的人類學」則研究自身的社會，包括國家內部的他者。這個差異會影響理論的生產，因為對自身社會進行研究的人必須在一個較為政治化的脈絡之中，適應、採用、和轉變源自中心的既存概念或創造新的概念，這動力導致不同的人類學生產。不過，需要進一步確認的是，在什麼條件之下，人類學者可以成功地發展較具洞察力的實踐，在支配和剝削的真實生活情境中，來連接權力的施行和真理的生產。必須意識到許多的地方知識，包括地方人類學的知識，是在知識和政治的張力中進行開展的，因此不能僅以規範的學術術語來評價這些地方知識。不過，要做到這一步卻是困難重重，包括政治參與的知識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以及人類學與當地人之間或人類學家內部世界觀和研究方法的溝通性與相稱性等難題。

綜言之，如 Fabian 所建議，「世界人類學」應該持續作為一個浮動的概念。作為實踐，「世界人類學」本身是浮動的。目前人類學研究有雙重的驅動力，一個是全人類共享的人性，另一個則是對不同人群之間顯著歷史差異的知覺。過去人類學者是以現代主義對人性的觀點來探討全人類共享的人性，不過在今日，共享人性的議題有了更複雜的面向，包括生態、文化和政治等面向。同樣的，直到最近，學術界才開始發展出一些語言來指涉在全球情境中歷史差異的問題，例如用多元性（diversality）的概念開始去面對不同人群之間顯著歷史差異的議題。

結語

最後，Gustavo Lins Ribeiro 和 Arturo Escobar 在導言中，透過巴西人類學者 Alcida Ramos 對「世界人類學烏托邦」的冥想，來進一步說明這本書所勾勒的願景。「世界人類學烏托邦」是類似一些亞瑪遜群體的多元語言主義，語言外婚的法則創造了多元聲音的社群，一種有組織且團結的巴別塔。在此多元地景中，所有群體都能貢獻各自的語言、觀點、解答和計畫，沒有任何群體會喪失其認同或地方特色，這些認同與特色都能被保存作為象徵資本，貢獻於大同世界的營造。雖然人類學離此目標尚遠，但至少已經開始想像這樣的理想世界。假如把烏托邦視為是對未來意義的當下奮鬥的話，那麼「世界人類學」的計畫的確有烏托邦的反射意涵在內。

「世界人類學」同時是智識的也是政治的計畫，提倡的不僅僅是多元文化主義者所強調的包容的社會多元性，而是更積極地認為各地的人類學皆能得益於已在全球的空間中存在的學問。不過，要達到「世界人類學」的計畫目標，仍需要一連串的變革與關注來達成，包括留意人類學之間不均等交換的情形，考量各式各樣的歷史、軌道、語言、概念架構、政治承諾、跨國主義和網絡經驗等。認真思考這些面向將可能開創新的對話，以及不同的交戰途徑。需要讓「人類學的整合」與「多元的人類學」這兩個觀點處於相互張力的狀態之中，以非霸權和容許多元性的方式達到開放的整合，放棄傳統普同的觀點讓多元性得以滋生，強調多樣性是創造力的首要原則。

因此，「世界人類學」不該被認為是像一些後殖民理論的簡單論述一般，是邊陲人民對殖民權威進行反擊的新嘗試。不是這種下對上，邊陲對抗中心的思維。相反的，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該思考目前是人類學水平擴展的時刻，當代的資訊與溝通技術讓世界各地人類學者之間有較多的水平溝通，因此能產生較為複雜的交換模式。這讓人類學的實踐有機會成為一個較為豐富的世界主義，有能力處理二十一世紀方興未艾的種種挑戰。「世界人類學」的概念提供了一個機會空間，讓在知識、文化、社會、和生態的基礎上，將多元性視為珍貴資產的人可以努力發揮的空間。綜觀人類學的歷史，這個學科數次的死亡與重生顯示人類學有能力改變自身，重新定義學科的旨趣與目標。人類學本來就擅長於留意不同時空中社會文化的差異，在當今全球化的世界中，召喚多元的國際聲音和觀點，對人類學知識的新探索積極地進行考量。既然人類學最基本的課程就是對差異的尊重，全球化的世界是人類學可以生生不息的完美場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